

借鉴传统，推动现实主义创作发展

□傅书华

我们正处于一个如鲁迅所言的“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百余年来，我们经历了复杂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相应地，建筑在这基础之上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形态及其所蕴含的精神结构、情感形态亦轻重不等地繁杂地共时性地作为既有的文学资源呈现于今日中国的文学界。那么，有哪些文学资源是在推动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时应该着重学习与借鉴的呢？

古代文学中的“风雅精神”

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谱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庙堂、士大夫、民间。庙堂价值谱系的核心是，依据经济形态、政治结构和社会治理的需要，强调文艺的教化；民间价值谱系的核心是，用文艺来表达个体的愿望和需求；士大夫价值谱系相对复杂一些，因为“学而优则仕”，士大夫和庙堂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他们意识到“民为载舟之水”，所以有时候又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因此，这三者的区分只是思考维度上的区分，在实际的历史中，更多的是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三种价值谱系中，对民间价值谱系的研究需要加强。特别是在当下，它与全民高度重视自我需求的时代性特征极为吻合。士大夫们的写作中，也有很多与民间交叉的部分，生动地书写了民间的现实，这同样是我们需要不断去继承和发展的。

较早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首推《诗经》中的“风”：《关雎》《氓》之男女之情，主要是个人的情感；《硕鼠》之恨之愤，是因自家利益被剥夺而发；即使征战胜利归来，也有“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忧伤。当今时代，在微信、微博等传媒形态中，时时有“风”刮过。先进的科技与原始的诗歌精神，远隔着千秋万代，却相互呼应着，共同养育着个体生命的自由与自在。

到了“汉乐府”，“风”势不减。以《木兰诗》为例，木兰打仗出于为父着想，并无功名之心，所以，功成名就归来，对那万千人求之而不得的“尚书郎”不屑一顾，而只急于“还故乡”。这里有着民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在与自由。这其中蕴涵着一种健康、强大的精神形态。

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其积极能量在盛唐时代达于极致。李白的自由个性、杜甫的儒者情怀，体现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两座高峰。杜甫是典型的士大夫，他以一大批乐府诗书写唐朝社会历史发展的概况，既记录史实，也描绘情绪，因此其作品被誉为“诗史”。他这种及时书写时代、处理现实的能力，一直被后人所称道。中唐的白居易沿着杜甫的道路往前走，尤其强调诗歌的现实性，提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反映民间疾苦。到了晚唐，时代的风云际会，转化为个人的低语。因此，杜牧“十年一觉”之“梦”，与士大夫的“修齐治平”之“梦”有所区别；李商隐则将时代沧桑转化为男女之间的私语。当然，他们也写了许多具有历史感慨和现实指向的怀古诗。

到了宋代，商业文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文人的生存空间更具伸展性。最初作为“艳科”的宋词，慢慢成为了记录自我情怀和市井生活状况的重要文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文学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元明清三代之文学，以戏曲和小说为主要代表。戏曲领域的《窦娥冤》《西厢记》《琵琶记》《长生殿》《桃花扇》等，小说领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题材各异，或讲述历史，或记录现实，但都写下一个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终于，“一切传统的写法都打破了”，有了《红楼梦》的出现。这体现了古代小说的巨大表现力。

从《诗经》到《红楼梦》，有一些线索是一脉相承的。比如，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的记录，文学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不断发现。这些正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逻辑起点。所以，五四文学的先贤们虽然声称反思传统，但又大都都有着深厚的传统积累，用现代人文观念重新发现优秀文化传统并传承之。

“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经典，都为我们提供了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精神气象的典型人物。在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相互纠葛，共同呈现了那些繁复的历史经验”

辑起点。所以，五四文学的先贤们虽然声称反思传统，但又大都都有着深厚的传统积累，用现代人文观念重新发现优秀文化传统并传承之。

新文学传统中的宝贵探索和经验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涌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特别是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的小说，以深刻的思想和多样的艺术探索为我们展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魅力。

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的价值虽然不断被发现，但总体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五四文学有两个核心观念，面对过去的判断是“吃人”，面对未来的希望是“立人”。五四新文学从这样三个角度来书写“个人”：一是表现“个人”的觉醒过程，二是批判资本和权力对“个人”的损害，三是书写新的“个人”生活形态。具体来说，“个人”的觉醒过程，既是激动人心的，如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决绝；是令人陌生的，如冰心《寄小读者》中的博爱；也是令人迷茫的，如郁达夫《沉沦》中的痛苦；但更是充满着挣扎而出的痛苦，以及觉醒之后无路可走，而对绝望进行的反抗，如鲁迅的小说《孤独者》《在酒楼上》。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二月》《金锁记》《呼兰河传》《家》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身影。无序的资本和权力带来的疼痛，给人的感觉更加强烈。吴荪甫、骆驼祥子、王利发等人的命运，无不带有时代和社会的烙印。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也有很多作品表现崭新的“个人”生活状态。特别是到了今天，我们物质生活已经有极大的提升，精神上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文学应该呼唤着丰裕物质生活基础上的新的精神品格的健全，呼唤着代表着这新的人生方式的新人的出现。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从无产阶级文学、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再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文学线索。在这个过程中，各个节点的嬗变、各个构成形态的命运，对发展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深刻地影响了文艺创作的走向。赵树理承载民间价值谱系的文学，以及“赵树理方向”的提出，还有孙犁、丁玲、周立波等人的文学创作，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文艺的影响力。进入新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不断发展，代表性的作品是“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时候的“个体”，是与“集体”融为一体的“个体”。其所体现的精神形态，影响了整整一代国人的青少年时代的精神成长。

从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到延安时期（一直延续到前二十七年）的“人民文学”，再到1980年代中后期开启的“个人写作”，“个体”的地位在沉浮浮沉之中。这些文学发展的历史，给了我们丰富的思考空间：如何塑造出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这一个”？如何表现

个体命运与时代现实之间的复杂纠葛？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的文学经典，都为我们提供了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精神气象的典型人物。在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相互纠葛，共同呈现了那些繁复的历史经验。

西方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与真实性

十九世纪的西方经典现实主义，对于推动当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现实主义文学要歌颂那些为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奋斗、甚至作出牺牲的英雄，也要批判那些自私自利的、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个体。这当然不是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判断，还是应该考虑到每个人的复杂性，考虑到每一个个体的实际处境。但无论如何，歌颂与批判之间的辩证法，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索的。

以细节的真实，直面并书写人的生存形态，是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呈现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下的个体命运的主要文学方式。这一方式也特别适合当下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这个时代的生活是这么丰富，也充满了各种悖论式的元素。这些经过作家的观察与提炼，就有可能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符号。我们只要大略看看新时期以来各种人文思潮在中国大地此消彼长或同时共存并已经渗透于中国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的现实，对此即可了然。于是，回到事物本身，直观事物本质，重视写实的力量，就足以克服一些作者思想资源的局限与缺失。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以写实的力量战胜世界观的局限，并将之誉为“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伟大特点之一”。

近些年来，中国人文学界对史学范式的学术追求，以及对非虚构的重视和实践，更是说明了这一点。现实主义重新获得了它的时代性，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理解了历史的纵深，或许才更有益于我们对现实作出判断与选择。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



声音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给我们一度沉闷的文艺批评注入了难得的生机与活力。然而，由于许多批评家过于偏信和推崇西方文论，于是剑走偏锋，拾人牙慧，言必称“西”，忽视了传统文化之根。检视近些年的文艺批评，援引西方文论的多，关注古典文论的少。一些批评家撰写批评文本，必从西方国家那里引入理论资源，好像不提弗洛伊德、拉康、科林伍德等理论名流，都不好意思在批评界混了。可以说，这与我们对传统文论的重视不够有关，这显然不利于进一步建构中国特色文艺批评理论体系。

再看我们现在的一些学术刊物，刊发出来的很多大块文章，引经据典，虚张声势，唯独没有作者自己的见解现身。在一些学院派的批评文本中，看不到传统文论、传统批评话语，他们羞于再提曹丕、陆机、刘勰、李渔、刘熙载、王国维等人的名字，而不知节制地让西方文论生僻的概念、术语在其文章中驰骋。尽管作家和读者读起来一头雾水，但批评者依然我行我素、引以为豪。诚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的，“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因富强也”。他们对西方文化、西学概念视若至宝，说起解构主义、布拉格学派、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视觉文化等如数家珍。

以开阔的视野来学习、包容西学，这本是好事，也有利于我们以新的视野展开学术批评。但我们不能舍本逐末，忘掉了自己的“根本”。这个“根本”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传统文论，它与我们的历史文化、精神体验有着复杂的关联；二是我们当下鲜活的生活现实，活生生的文学现场。如果引进来的西方文论，能够经过我们有效消化，并进而获得对当下文学生活的阐释力，这当然是值得鼓励的。当然，我们的目标也不止于此。我们需要再进一步，基于当下的文学实践，将中西已有的文论进行“熔铸”，建构起契合当下中国的崭新文论话语。于是问题来了：理想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怎样的？文艺评论应该通过怎样的渠道吸取力量、恢复元气？这是摆在每一位文艺批评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诚然，当年鲁迅先生亦曾说自己只看外国的东西，但殊不知，这是他对当时国内文艺批评失真状态的失望和不满所致。鲁迅这么讲，并不证明他对传统文化、本国文艺理论持全盘否定态度，也不代表他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论批评体系不予重视。事实上，鲁迅先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在他诸多杂文式批评文章里，随处可见对于传统文化理论的继承和运用。在鲁迅后期杂文、书信中，他在对陶渊明作品进行分析时，巧妙地贴切地引用了陶渊明的诗句，指出陶诗“既有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对陶渊明的评论，从文章题目中的“魏晋风度”来看，也颇具传统文化色彩，没有丝毫的西洋味儿，彰显了他的传统文化造诣的深厚和笃实。

置身文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互联网信息时代，中国文学原有的理论体系资源受到挑战，乃至需要补充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和襟怀适当吸收西方理论资源，丰富与深化中国文艺理论库存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必须与进一步重视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和继承发展相结合。我们需要在中西文化结合、互补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批评体系进行不断完善与科学重建。

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批评体系，对文艺事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欲达此目标，先要摆正文艺批评与传统文论的关系。文艺批评与传统文论的关系，应当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理论批评界对“批判”维度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而对“继承”维度则相对忽略。鲁迅在《摩罗诗力论》一文中说：“国民之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而其怀也，思理朗然。如监明镜。故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也不死。”“时时进光明之途”，即不固守传统；而“时时念辉煌之旧有”，则是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因此，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理论、传统文艺批评的继承与发展。

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批评体系，是一项浩大工程，需要一大批具有建构思路和诚意的文艺理论批评精英的持续勘探，“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些工作，苦则苦矣，难则难矣，但它是必须做、值得做的事。每一位有志于此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都应该勇敢地担负起这一光荣使命，共同探索着前行。

古语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人类的特点与优良，就是善于思考。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我们有着丰富的文论传统，理应在文论建构上走在世界的前列。对于当下中国文艺理论界而言，最重要的是原创性理论体系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积极吸取传统文论中那些有生命力的资源，积极化用诗言志、诗缘情、通感说、文气说、风骨说、咏论、童心说、境界说等文论，也要吸取西方从传统到现代的各种文论资源，并基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现实进行新的创造。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外之既不适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可以说，鲁迅此言，是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的正确思路。（作者系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何向阳《如初》首发：40年诗歌写作的总结

本报讯 8月20日，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诗人、作家、学者何向阳携最新诗集《如初》亮相上海书展，并举办诗集首发分享活动。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作家潘向黎，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扬子江诗刊》主编、诗人胡弦，文学评论家方向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副社长孙茜等参加交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言宏受邀视频分享。

《如初》是何向阳诗歌写作40年的沉淀之作，精选了她从1980年代至2020年代创作的170余

首诗歌。何向阳表示，《如初》是对她40年诗歌写作的一次总结，也是她迄今最厚重的一部诗集。她说，从少女时期的“被看者”“等待者”形象，变成“行动者”“奔跑者”，然后成长为能写出许多“逆行”诗句的对爱和信仰有全新观点的女诗人，这部诗选每个阶段都对她有重要意义。

潘向黎认为，何向阳是一个内心充满澎湃情感的人。“她每想表达一个意思、一种情绪，都同时会有很多对立的词语去拉扯它们。她内心有强烈的冲突，她的表达也有一种曲折性，像复杂的地壳运动，具有

强烈的情感力量。”胡弦表示，这些诗作兼具个人情感和社会变迁，从中可以读到何向阳不同阶段的转变。张新颖认为，何向阳通过诗歌写作和语言建立起自觉的亲密关系，诗集以清晰的脉络呈现诗人漫长的创作历程与精神图景。何言宏表示，“道路”和“远方”常出现在何向阳的诗作中，向着远方奔赴长征是她诗歌中最为突出的精神形象，充分体现了诗人精神上以一贯之的坚定性和我们这代人的精神特征。方向真感慨，《如初》清新地打量这个世界，怀着最初的热情探讨这个世界，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沪闻）

专家研讨骆平小说《半糖时刻》

本报讯 8月16日，由四川省作协主办的骆平高校系列作品《半糖时刻》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侯志明，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评论家、编辑家参加研讨。

长篇小说《半糖时刻》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与骆平最近再版的短篇小说集《过午不食》聚焦高校生活，多维度讲述大学故事，刻画高校师生的文学群像，呈现出

时代变迁中的人文精神气质。

研讨会上，与会者从《半糖时刻》的精神内核、人物刻画、语言构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这是一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思之书。书名中的“半”指涉了一种人到中年的状态，小说也用点到为止的写作方式很好地呼应了这种状态。骆平分享了《半糖时刻》的创作背景和创作理念，并表示她将继续坚持书写成都故事，不断探索和追求文艺创作的新高度、新境界。（周璟）

《逍遥仙儿》发布会举办

本报讯 7月29日，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石一枫《逍遥仙儿》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张悦然、刘秀娟、吴丹丹参加交流。

该书围绕三个家庭的育儿生活经验，呈现出各家的欢喜哀愁，勾连出一幅当下北京众生相。小说的男主角公是一位观察者，他的身份是导演，他用摄影机记录，用他的视角给大家看一个关于教育的影片（或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两个母亲。张悦然表示，《逍遥仙儿》的背后有着“石一枫式”的温暖，小说最后可以落在一个让人感到慰藉的地方，人和人最终会找到相同的部分，彼此认同、彼此谅解。关于小说集中探讨的教育话题，刘秀娟认为，真正的教育是教会我们如何发现、尊重生命的规律，激发孩子内在的生命力。在这一点上，文学与教育殊途同归，文学包含着对人的关怀，它让我们思考，让每个人寻找自己的答案。

谈及创作缘起，石一枫说：“《逍遥仙儿》反映了我一贯的创作追求：从最贴近我们的鲜活生活中找到创作资源，然后从我们身边发生的事里总结出一点心得、一些想法。如果这个想法是独特的，有新意的，那么我觉得，这篇小说就没有白写。”（何晨）

米谷漫画展在京开展

本报讯 7月28日，由广东美术馆和北京画院主办，海宁市图书馆米谷漫画艺术馆、延安鲁艺文化中心支持，北京画院美术馆承办的“这是一个漫画时代：米谷的1945-1965”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

米谷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漫画家，他创作的多幅漫画作品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经典。本次展览是北京画院自2007年推出“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以来，首次以漫画为主题的研究和呈现。展览聚焦米谷1945年至1965年间人生历程和漫画历程的四个重要阶段，展出米谷近120件漫画原稿，涵盖了米谷漫画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20年的代表性作品。

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表示，以断代的方式将米谷艺术创作生涯中的20年作为研究重点进行探索，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以冷静的素描方式尽量勾勒出米谷艺术人生的轨迹。

“父亲一生从事漫画创作，笔耕不辍。他勤奋作画的身影成为家中晚辈童年、少年时期的深刻记忆。”米谷之女朱忆林说，父亲早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将自己的生命和艺术融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李晓晨）

《烽火塘田》塑造奋进的抗战师生形象

本报讯（记者 王觅）8月14日，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湖南省电影局、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中共邵阳市委宣传部、湖南潇湘第二影业有限公司承办的新片《烽火塘田》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

多年来，潇湘电影集团坚持高扬鲜明的地方特色，积极配置地方文化资源尤其是红色文化资源，以中小成本创作拍摄了《烽火塘田》等一批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优势和创作传统。《烽火塘田》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国统区湖南邵阳塘田创办战时讲学院的革命历史故事，塑造了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为代表的报国救亡、热血沸腾、教书育人、刻苦学习的抗战师生形象。该片由周琦执导，曹磊、刘筠燃等主演，预计将于今年9月教师节上映。

与会者认为，《烽火塘田》真实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培养抗战人才的战略眼光及其努力实践，通过在统一战线框架下组织知识分子在塘田艰苦办学的历史事件，栩栩如生地塑造了战争动荡中砥砺奋进、坚持教学的师生形象，填补了抗战题材影视创作中的这一空白，对于传承弘扬党的教育方针与办学理念，学习发扬吕振羽等前辈的革命精神，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影片还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来自国民党营生、绿林武装和乡绅等各方人物的精神转变轨迹，从而艺术地彰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线的巨大力量。

谈及创作初衷和体会，周琦表示，该片力求以简洁真实的烽火历史图景展示将统一战线背景下的不同人物集合起来，希望通过其具体的生活细节、生动的个性风采和人格魅力，向当下青年观众展现这一相对陌生的历史事件。